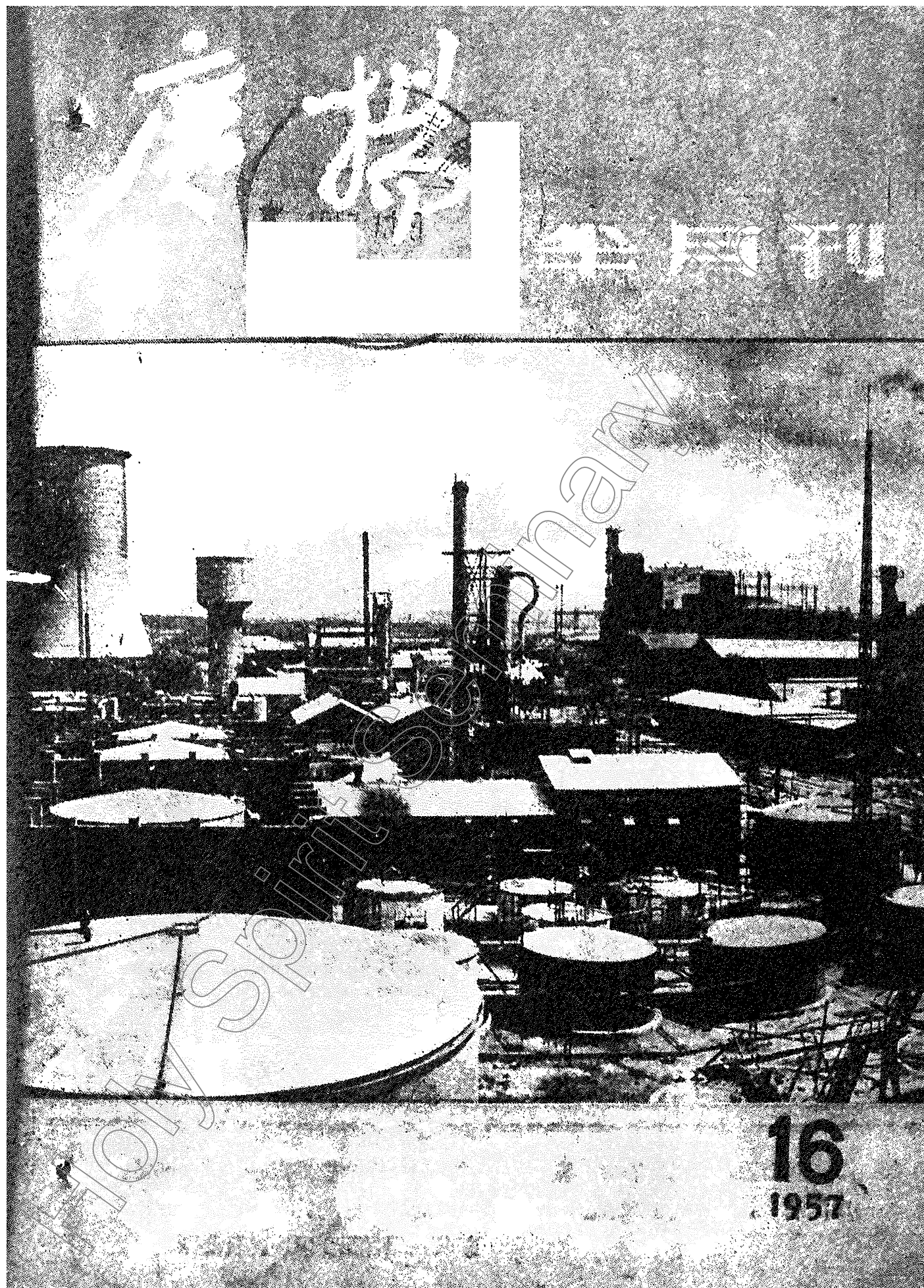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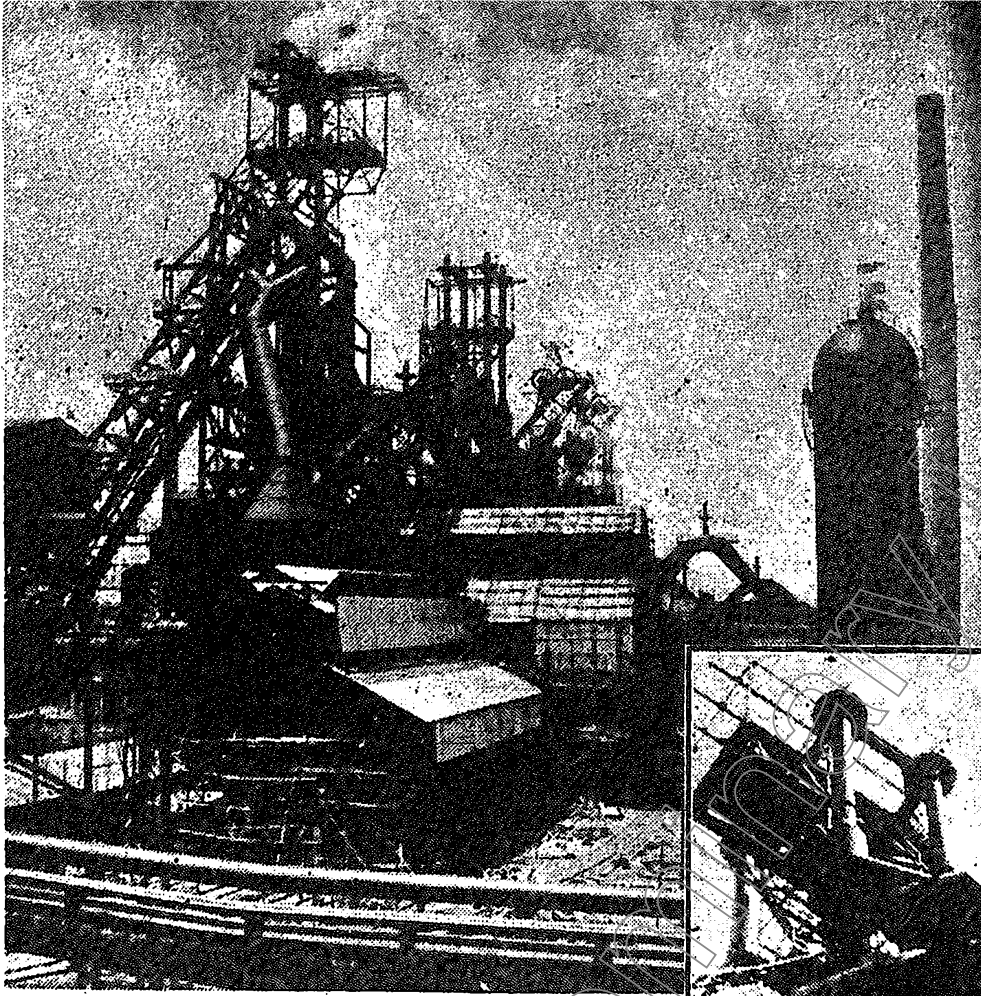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工业

全 国 工 业



16
1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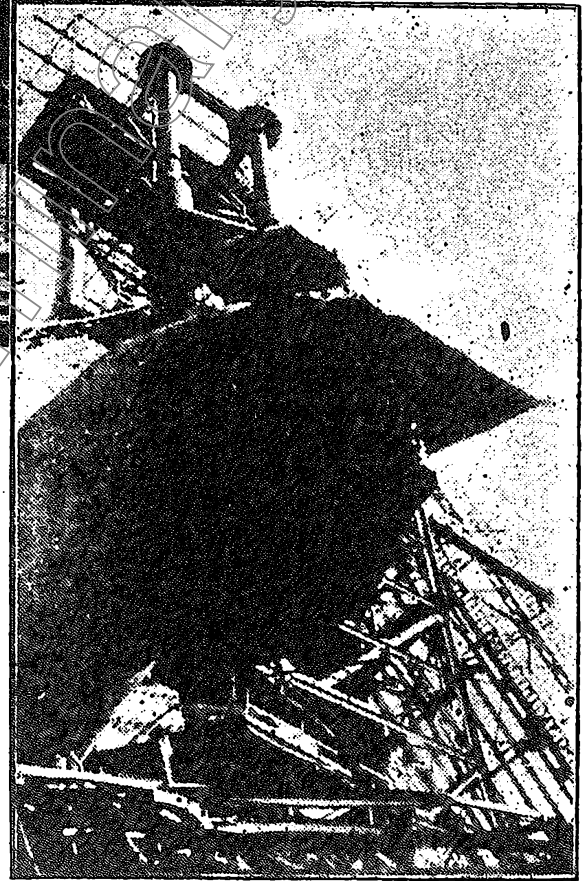


左上：被國民黨破壞的鞍鋼九號高爐已在去年修復投入生產（最前一座），它改用了新的設備，產量遠比原來的大。幾年來我們恢復了被日本、國民黨破壞的高爐已有九座。

新華社記者楊禮門攝

右下：解放前，被國民黨徹底破壞了的鞍鋼最大的煉鐵爐——九號煉鐵爐。

新華社稿



封面說明：撫順石油工廠是我國唯一的高壓加氫工廠（由原油加氫製成汽油）。在設備上和理論操作上，都是比較複雜的。

新華社記者王少

河承漢攝



1957年第16期(總第145期)目錄

半月談：擊敗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2)
堅決反擊教會內的右派分子！.....	李德培(5)
津愛國會集會揭發批判右派分子聶國屏高慶琛.....	(7)
聶國屏無法抵賴低頭認罪.....	(10)
堅決與教內一切右派分子進行鬥爭.....	張濟棠(12)
反帝愛國運動的成績不容抹煞.....	汪繼鈞(14)
鯨鯨擋車者應當猛醒.....	吳東辰(15)
不許高慶琛放火放毒！.....	田靜(17)
界限明得很.....	鄭紀中(22)
高慶琛的反動臉譜.....	隨守義(28)
右派分子聶國屏的面目醜惡.....	曹傳新(32)
用事實駁斥右派分子的謊言.....	本刊記者(35)
春在鬼魅現，言微毒害深.....	何家修(39)
金蘋果.....	(42)
讀者來信.....	(44)

廣 揚 (半月刊)		1957年第16期(總第145期) 1957年9月25日出版
		價定：每冊1角
		訂 閱 價 目
編 輯 兼 出 版 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個月 6期 0.60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個月 12期 1.20元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9號)	1年 24期 2.40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不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郵局新聞稿件特准掛號登記許可證第40號		

擊敗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 猖狂進攻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借幫助黨整風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行了猖狂的進攻。兩個多月以來，廣大的工人、農民、覺悟了的知識分子；給予他們以猛烈的反擊，右派分子紛紛陷于孤立，有的已繳械投降，他們要推翻共產黨、搞垮社會主義的反動居心已大白於天下。這一場激烈的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們必須對之有一個充分的估價，並積極地投入到鬥爭當中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同志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我們同右派的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關係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不要社會主義，不要工人階級領導，不要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聯合蘇聯，那就只能亡國。右派的主張就是要我們亡國，就是要我們人頭落地。”

廣大的勞動人民已經看到了右派分子對祖國，對社會主義的危害性，也意識到了反右鬥爭的嚴重性，所以憤怒地起來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捍衛了社會主義。

我們廣大的教友在這次鬥爭中應當抱怎樣的態度呢？百年來的慘痛歷史告訴我們：在舊社會裏，我們不僅不會有美好的現實生活，並且我們的教會也被帝國主義者所把持，作為他們侵略、壓榨中國人民，奴役、摧殘我國神長和教友的工具，使我們的教會蒙羞，使我們的教友受累。右派分子的企圖，就是要把舊社會的這種悲劇在我們當中重演。我們是萬萬不能允許的。這是因為，我們除去負有保衛社會主義的責任以外，還有保衛聖教會的使命，一肩兩任。如今我們的神長教友積極參加反右鬥爭，站在反右鬥爭的最前列，就是我們目前愛國愛教的具體內容。

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右派分子，在社會上右派分子猖狂向黨進攻的同時，也大肆叫囂，惡毒地攻擊黨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我們正義的反帝愛國運動。在天津市天主教中揭發出來的右派分子聶國屏和高慶琛，就是在這些方面進行罪惡活動的。

聶國屏是我會的副主委，高慶琛是“廣揚”的編輯，他們勾搭在一起犯了許多反黨反人民的罪行。經我會全體工作人員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他們是仇恨黨、仇恨社會主義、仇恨天主教的愛國運動的；他們一系列的言行，都說明了他們是處心積慮地想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搞垮愛國運動。

聶國屏是愛國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而在鳴放期間，竟喪心

病狂地把過去愛國運動的成績一筆抹煞，並公開地為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張目，“申冤”，充分地暴露出他的反動面目。

高慶琛利用“廣揚”為陣地，在最近一個時期裏煽風點火，大量放毒，向黨和政府進攻。有許多教友已經向我們提出質問以至於抗議。我們願意誠懇地表示接受，並且在這裏向大家表示：我們一定吸取這次經驗教訓，徹底檢查“廣揚”半月刊最近一個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糾正錯誤，改進工作，使這個刊物沿反帝愛國的道路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親愛的讀者們，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正在全國範圍內深入地展開，正確的認識這一鬥爭的重大意義是十分必要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企圖陰險毒辣，居心叵測，我們對之不能麻木不仁，溫情姑息。在我們這次對身邊的右派分子聶國屏、高慶琛的鬥爭中，使我們深深體會到麻痺、溫情為害之大。我們必須堅決地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將他們的醜惡面目徹底揭露出來，堅持說理鬥爭，迫使他們低頭認罪。這樣，不僅可以摧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同時也教育了群眾，提高我們的社會主義覺悟，提高我們辨是非明善惡的能力。我們也正告一切右派分子：只有真誠悔過，徹底交代，回到人民這一邊來，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會全體工作人員願意和津市愛國的神長教友以及全國神長教友們共同携起手來，向社會上的、教會內的一切右派分子繼續進行堅決的鬥爭，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堅決反擊教會內的右派分子！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副主席 李德培
天津市天主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

全國各地的神長教友們在黨和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掀起了反帝愛國運動，幾年來取得了很輝煌的成績，神長教友都提高了政治覺悟，充分地發揚了愛國主義的精神，我們的教會在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控制之後，也向健康的途徑上邁進。在這個勝利的基礎上，於今年六月間在北京舉行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總結了過去幾年來的成績，作出今後天主教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等的決議。這是十分令人歡欣鼓舞的。但是，教內的右派分子們不甘心我們的國家一天天地向着富強康樂的道路上發展，他們妄想扭轉歷史車輪，他們千方百計地為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分子辯護，企圖他們捲土重來，使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復

辟，把中國再行拖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因此，他們向黨向社會主義進行了猖狂的進攻。此次被揭發出來的天津市天主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副主委聶國屏和“廣揚”半月刊編輯高慶琛都是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破壞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右派分子，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必須對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

右派分子聶國屏、高慶琛的反動言行，決不是偶然的事情。所謂鬥爭帝國主義時政策界限不明，傷了虔誠教友的感情和自尊心等等謬論，歸納起來，其用心無非是煽惑、挑撥、離間天主教人士與黨和政府的團結，詆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歸根結底，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高慶琛更會公開叫囂“社

“社會主義制度也可以懷疑”。不過，我們說，廣大的覺悟了的教友不會叫他們的陰謀得逞的。

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給我們教會帶來了光明的前途，帶來了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勝利的可能。我們爲“生而逢時”額首稱慶！

過去由於我們進行了反帝愛國運動，使得我們的教會恢復了應有的純潔，中悅了天主，也取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我們衷心地感謝黨在我們進行這場正義的鬥爭中所給予的一切的支持和幫助。今後我們繼續遵循天主的誠命秉着良心的指引，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倘有人“肩播天命”，敢於反對，不管他有多高的職位，我們就有責任向他進行鬥爭。

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是勝利了，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也基本上結束了，但是還有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周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上說：“我們必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劃清界限，對這種人進行必要的堅決的鬥爭，使絕大多數真正愛國的人認識到右

派分子的立場和行爲的錯誤。右派分子一旦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他們本身就會發生變化。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分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周總理還說：“目前屬於人民內部的一些人或者某種集團，如果他們堅持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他們就有可能從人民方面轉化到人民的敵人方面去。”爲此我願意正告聶國屏、高慶琛以及教內的一切右派分子：必須接受批判，低頭認罪，洗心革面，徹底地改造自己，重新作人；千萬不要執迷不悟，自絕於人民。

現在全國人民在各地展開了反右鬥爭，全國的神長、教友們，特別是天津市的神長教友們要積極行動起來接受歷史給予我們的這個考驗，把思想武裝起來，站穩立場，投入這一偉大鬥爭！我們要在這次全國範圍的反右派鬥爭中，受到一次社會主義教育，提高我們的愛國覺悟，劃清敵我，辨明是非，只有這樣，才能在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裏，獨立自主地辦好天主教事業。

津愛國會集會揭發批判右派 分子聶國屏高慶琛

〔本刊訊〕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的工作人員，8月21日集會揭發和批判右派分子、愛國會副主任委員聶國屏和常委兼“廣揚”半月刊編輯高慶琛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破壞愛國運動的言行。大會由汪繼鈞秘書長主持。

會上揭露了聶國屏在鳴放時期在天主教內到處煽風點火，誣蔑肅反運動，為反革命分子“申冤”。愛國會工作人員潘雨田揭發：聶國屏會佈置潘雨田搜集被逮捕過的反革命分子的情況，並指示潘鼓動這些人向聶國屏訴“委屈”。當時潘執行了這個指示。潘雨田還揭發聶國屏會在教友中公開散佈“聖母軍”不是反動組織，並說：“凡天主教友的案子都是唯心唯物的問題，並不是從政治上反對共產黨，將來這些案犯都可以釋放，我就準備到北京去提出釋放龔品梅的問題。”

在天主教和基督教青年的一次集會上，聶國屏曾經說：政府對宗教青年歧視，以此來煽動有宗教信仰的青年仇視黨，向黨進攻。

會上，還有很多人揭發聶國屏與高慶琛、潘雨田等密謀改變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的性質，計劃將天主教友的愛國組織轉變為解放前特務分子于斌操縱的反動組織“天主教文化協進會”。他們的計劃，第一步是在會內設立一個“文化沙龍”，為此，潘雨田在聶國屏指示下會積極聯絡過去“天主教文化協進會”的舊人及反對愛國運動、對黨不滿的知識分子。聶還指示潘雨田“多找一些帶帝國主義毒素的神父、教友”參加“文化沙龍”。

會上還有人揭發聶國屏會企圖在天主教內發展民盟組織，會一再鼓動右派分子高慶琛“火燒入盟”，

並部署高慶琛、潘雨田網羅發展對象。

天主教愛國會副秘書長李耀宗、巨景昌及常委隨守義以大量事實駁斥了聶國屏散布的“在解放初期的反帝鬥爭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明，傷害了很多虔誠教友的感情和自尊心”的謬論。李耀宗揭發了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的侵略罪行及“聖母軍”的反動活動後，質問聶國屏“反帝鬥爭傷了誰的心？是傷了帝國主義分子的心！”許多人在發言中都列舉了解放後的宗教生活等方面的許多事實，如解放後天津市教友恢復了聖誕占禮的子時彌撒，各堂口教友進堂人數日有增加，以及由政府協助新建、改建了小德肋撒、新開路兩座聖堂等，粉碎了聶國屏的挑撥性的謊言。李耀宗還揭發說：聶國屏曾造謠說，“上邊有指示，教會醫院、學校、慈善機關的財產要清算，將來可能要發回。”質問他是那裏來的指示？聶國屏是想以此來挑起教友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煽動教友向政府倒算。

根據會上的揭發，右派分子高慶琛是一個對黨，對人民有着極端仇恨情緒的人。高慶琛在抗戰期間做過漢奸，解放戰爭期間曾擔任國

民黨軍報中的經理，還陷害過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解放後曾被捕，被判處徒刑。高慶琛到天津天主教愛國會後，曾一再辱罵共產黨和擁護共產黨的教友，說共產黨是“黃牛黨”，說積極分子是“一窩蜂”，更一貫打擊領導，挑撥工作人員間的關係，甚至還懷恨毆打積極分子；破壞天主教愛國運動的工作。愛國會工作人員隨守義、吳東辰、羅尊禮、李學溫、高露然、張世奎、張鼎鈞、張烈武、劉建仁、潘雨田等人在會上揭發了高慶琛一貫散布反動言論。高所散布的“人活着是爲了吃飯”、“社會主義制度中還會出現階級”、“匈牙利事件時蘇聯出兵是干涉內政”等謬論均受到了有力的駁斥。在黨開展整風運動以後，他更是到處煽風點火，鼓勵教友向黨和政府進攻，反對社會主義。他說：“現在社會制度也可以懷疑”，並爲南開大學右派分子雷海宗撐腰說：“人民日報壓制鳴放。”

“廣揚”半月刊助理編輯田靜揭發了高慶琛把持“廣揚”半月刊，猖狂地向黨進攻。高慶琛曾寫過“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祭獻”、“春在微言”等文章，陸續在“廣

揚”上發表，用隱晦的字句來攻擊黨的宗教政策，打擊積極分子。在今年6月14日出版的第12期“廣揚”上，高慶琛更有意識的轉載了聶國屏、趙振聲等人攻擊黨和政府的發言，並加編者按說是“幫助”黨整風。同期上，又發表了高寫的“天津青年教友的‘爭鳴’”一文，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把天津市天主教友描繪成受歧視沒有宗教信仰自由，企圖以此煽動廣大教友與政府對立。那篇報導發表後，受到青年教友及他們家長的嚴厲指責，揭穿了高慶琛捏造事實的陰謀。

在此期間，高慶琛會一再提出要以“廣揚”編輯部的名義，召開神父、教友座談會，來進一步煽風點火，向黨和政府進攻。只因領導方面沒有同意而未成。爲了要在全國天主教內點起火來，高慶琛還在6月1日以“廣揚”編輯部通聯組名義，給國內各地通訊員發出徵稿信，要他們盡量搜集各地神長教友的意見，寄到編輯部來。他還準備在“廣揚”上開一個專欄，專門登載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田靜遠揭發，高慶琛與“新晚報”編輯史振華會幾次密謀，並通過史投稿給“新晚報”向黨進攻。高寫了

一篇“何必憤慨？”的文章爲儲安平報不平，企圖通過史在新晚報上發表。另外，高慶琛與史振華合謀寫了一篇“向愛國會吹灑一些和風細雨”的文章，想在“廣揚”上發表。這篇文章把愛國運動幾年來的成果一筆抹煞，並惡毒的歪曲政策，爲帝國主義辯護，爲反革命分子張目。

參加這次大會的，除了天主教愛國會工作人員之外，還有基督教界、佛教界人士及天津市天主教房產聯合經營處工作人員多人，鬥爭大會進行了一整天。與會羣衆在揭發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時，情緒極爲激昂，爭先恐後地要求發言。最後，聶國屏在會上表示低頭認罪，並願意作徹底的交代。高慶琛的態度極不老實，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憤怒，正告他必須老老實實的徹底交代。現愛國會全體工作人員正繼續集會，對高慶琛的反動言行進行猛烈地追擊。

〔又訊〕天津愛國會於8月24日召開了第17次常委會，除對聶國屏、高慶琛的反動言行進行了嚴厲的駁斥外，並作出決議：繼續深入開展反右派鬥爭，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聶國屏無法抵賴低頭認罪

〔本刊訊〕據“天津日報”報導，民盟天津市委、民盟天津師院支部自6月中旬以來，多日連續集會，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民盟天津市委員、天津師範學院總務長聶國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據揭發，聶國屏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公開為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犯罪分子辯護，還誣蔑“土改”、“三反”、“肅反”等政治運動“搞錯了”。他在以天津市人民代表身份視察了肅反工作以後，竟要替反革命分子翻案，揚言

“過去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今天都應該宣判無罪”。他在天津師院指揮他的小嘍囉貼了許多造謠、誣蔑、攻擊共產黨的大字報。

6月14日，民盟天津市委舉行了擴大會議，會上，民盟市委委員徐景星指出：聶國屏在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的發言，“實質上就是否定過去一切的政治運動，號召一切對過去歷次運動不滿的人起來‘平反’，這就起了鼓動壞人作壞事的作用”，成爲“躲在黑暗角落裏的

人公開出來進行反黨叫囂的號召者與支持者”。

6月25日，天津師範學院民盟支部揭發和批判聶國屏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據揭露：聶國屏在學習“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時候，表示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但他認爲“美國的制度值得學習”。與會者還揭發了聶國屏誣蔑“土改”“三反”“肅反”都是“搞錯了”的大量反動言論。

天津師範學院民盟盟員和師生於7月15日舉行大會，揭發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聶國屏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在會上，教師和學生憤怒地揭發了聶國屏的反動言行，指出聶國屏以“幫助黨整風”爲名，有組織、有策略的向黨和人民進攻。聶國屏惡毒的誣蔑說：“肅反簡直是拿人權開玩笑”；又說：“整我的小黨員可以原諒，因爲他得聽市委的指示，而市委得聽中央的指示，根子在毛主席那兒。”

羣衆還揭發：在整風期間，

聶國屏公開提出撤換總務處兩個黨員的職務，並且鼓勵總務處職員劉增（盟員）鬧事。劉增在整風運動中，表現非常惡劣，曾大喊：“有冤報冤，有仇報仇”。聶國屏在盟的聯合小組上煽風點火，誣蔑領導和學校黨委；在聶國屏的操縱下，企圖用盟聯合小組的名義出大字報，向黨進攻，還開列了一個有五、六十人的所謂“黨風、團風、裙帶風名單”。在羣衆的揭發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聶國屏的反動面目已完全暴露，無可抵賴。

聶國屏在8月10日天津師範學院民盟支部召開的全體盟員大會上，初步交待了他的反動言行，並表示低頭認罪。他承認“反黨、反蘇、反人民，是有歷史根源的。在解放前從思想到行動都是極端崇拜帝國主義，仇視蘇聯、反共、反人民的”。還承認是“站在反動階

級立場，誣蔑‘土改’‘三反’和‘肅反’等運動是搞錯了”。他承認，“曾利用學習‘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機會，發表惡毒的言論，企圖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

目前，民盟師範學院支部，仍責令聶國屏繼續檢查，徹底交待他自己的反動罪行。

〔又訊〕天津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9月4日召開。會上，天津大學教授范恩銀教友發言駁斥了右派分子聶國屏的謬論；石道宏、馬文斌、岳樹德等三位神父作了聯合發言，一致指責了聶國屏誣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破壞天主教愛國運動的罪惡。

右派分子聶國屏在會上表示向人民低頭認罪，並向大會全體代表交待了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種種罪行。

尋 人

葛大存（女）現年42歲，河北武清縣沙河屯人，於1934年入天津西開孤兒院。如有知其下落者，請通知本刊或逕與其弟聯系（其弟葛文彬同志現在上海電車公司工作。地址：上海市重慶南路249號）。

堅決與教內一切右派分子進行鬥爭

天津教區神哲學院代理院長 張濟衆

在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期間，躲在天主教內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大舉向黨和政府進攻，放出冷箭，意在推翻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這種陰謀已被廣大的人民識破，揭穿了，並向右派分子進行了排山倒海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全國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階級鬥爭，也是關乎六億人民的命運和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的鬥爭。

自解放以後，中國天主教教友在黨的英明領導下，政治覺悟逐步的提高了，在反帝愛國方面，和全國人民一樣貢獻了力量。這是光榮的。但是，正當教友們有信心地在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的時候，多年隱藏在愛國組織內的聶國屏和高慶琛兩個右派分子被揭發了。一個是竊居愛國會的副主委，一個是竊據“廣揚”半月刊的編輯職務。他們利用了職務之便，在教友羣衆中散發了許多謬

論，並且到處點火，煽動是非，破壞教友和政府的關係；歪曲宗教政策；打擊進步教友，企圖使已被肅清的教會內部帝國主義勢力復辟，重新壓迫中國教友，統治中國天主教。如右派分子聶國屏抓住黨整風的機會，大放厥詞，他說：“在反帝鬥爭的初期，由於政府政策界限不明，傷害了很多虔誠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還說帝國主義分子反對共產黨“不是從政治上，而是反對共產黨的唯物主義”等等，往教友思想裏灌輸毒藥，製造混亂，以便混水摸魚。

政策界限不明嗎？解放以來，僅天津市就出現了兩座嶄新的聖堂。各堂口都有兒童要理班，唱經班，過主日進堂的教友，各堂都是擁擠着，大占禮的時候更是無法形容了。尤其在聖母月裏，從各堂往望海樓堂朝聖的教友有如潮水，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本年5月間，天津教區的11位神父去了農

村，在政府的協助關懷之下，傳教工作一帆風順地展開。政府宗教政策貫徹的情況是令人滿意的。

反帝鬥爭傷沒傷過一部分人的感情和自尊心呢？無疑地是傷了一部分人的感情和自尊心。是傷害了虔誠教友的感情和自尊心嗎？我認爲，反帝鬥爭取得了勝利，使教會及教友擺脫了帝國主義者的控制，正是提高了教友的自尊心。傷害了感情和自尊心的只有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嘍囉。聶國屏所謂的“虔誠教徒”是指的哪些人呢？是虔誠恭敬天主的人，還是效忠於帝國主義的人？兩者決不是一回事！聶國屏所指的只能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因爲反帝不可能傷害虔誠恭敬天主的人的自尊心的。

聶國屏還爲教內反革命分子申冤，他認爲：教內反革命分子不是從政治上反對共產黨，而是信神不信神的問題。若照此說，奉教人都該是反革命了？照此說，我們的教義不也有問題了嗎？聶國屏故意的把教義和政治混爲一談，顯然別有用心。聶國屏原是愛國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如今竟墮落到認賊作父，替帝國主義喊冤的地步，真是辜負了廣大教友對他的寄託。

右派分子高慶琛竊據“廣揚”半月刊編輯職位，盡力蒐羅對黨不滿的言論，充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彈囊，準備隨時向黨進攻。他還企圖用“廣揚”編輯部名義，召開神父教友座談會，準備煽動神長教友一齊向黨進攻，其用心之毒辣無以倫比。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廣揚”上不斷的出現煽動性的文章，在羣衆中的影響很壞，於愛國愛教宗旨相去甚遠。高慶琛用釜底抽薪、改頭換面的辦法，把“廣揚”變成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堡壘，這是廣大的神長和教友絕對不能容許的。

“廣揚”必須以反帝、愛國、愛教爲宗旨，這個立場絕不能動搖，我們有權力捍衛這顆在愛國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碩果，使它繼續作愛國運動的喉舌。

我們知道，共產黨領導我們所走的道路——社會主義光明大道，是符合六億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也是符合我們全體神長教友的基本利益的。右派分子妄圖“扭轉乾坤”，拖着社會車輪倒轉，真是螳臂擋車！希望全體教友繼續提高覺悟，堅決與教內一切右派分子進行鬥爭，不勝利不收兵！

反帝愛國運動的成績 不容抹煞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秘書長 汪繼鈞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聶國屏、高慶琛在猖狂地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時候，對天主教的愛國運動也進行了不遺餘力的破壞。聶國屏身為愛國會的副主委，高慶琛身為愛國會常務委員、“廣揚”半月刊的編輯，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和愛國運動應該是十分了解的。可是，他們却惡毒地歪曲事實，足見是別有企圖的。我現在僅就黨的宗教政策和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兩個方面，談談我個人的認識。

首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文載於憲法，毛主席以及中共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對於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都作過更明確的指示。解放後八年來，政府堅決地貫徹了這個政策，成績卓著，廣大的教友一直過着愉快的宗教生活。我

們天津教友的感受是相當深刻的。然而，聶國屏、高慶琛竟熟視無睹，惡意地向黨的宗教政策進行攻擊，否認主要的成績，打算挑起教友對政府的不滿。事實上，教友是非分明，沒有上他們的當，結果是引起了大家對他們的憤怒與譴責。

聶國屏所謂教友得不到政府的信任等謬言，不值一駁。因為各級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人民代表大會等，都有神長教友被選參加，聶國屏本人就是天津市人民代表。教會的青年們，參加了歷屆的青年代表大會，而今年代表人數增加數倍，其中有神長、修女、修道生多人，也都說明了人民對教友是信任的、尊重的。除非閉上眼睛不看現實的人，才能相信聶國屏的鬼話。

近百年來，我們天主教會一貫被地帝國主義用作爲侵略的工具，天主教的聖潔遭到人爲的破壞。同時，在廣大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很壞的影響。解放後，覺悟了的教友掀起反帝愛國運動，可以說是符合我們教友的切身利益和國家、民族的利益的，因此不僅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並也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幾年來，我們愛國愛教的事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而右派分子聶國屏、高慶琛竟對正義的反帝愛國運動進行誹謗誣蔑，嚴重地違反了教友們的利益，他們已經喪失了應有的代表性，我們必須聲討他們。

總之，天津市天主教愛國會的

工作，無論是在反帝愛國方面和在協助教友過好宗教生活上，所取得的偉大而又輝煌的成績是肯定的，也是主要的。教會內的右派分子歪曲事實，造謠誣蔑，抹煞成績，誇大缺點的陰謀都是注定要破產的。我們警告聶國屏、高慶琛，現在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天經地義，你們企圖復辟資本主義和妄想帝國主義重新奴役中國人民、把持和利用中國天主教會作爲侵略的工具是不可能的！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破壞愛國運動的反動罪行，必須徹底的交代，並向人民低頭請罪，只有這樣才是你們唯一的出路。

螻臂擋車者應當猛醒

吳東辰

反右派的鬥爭，在全國各地已經是熱烈展開了。經過這次偉大的運動，大大地提高了我們的社會主義覺悟。

我們大多數人是由舊社會過來

的，或多或少思想落後，這本不足爲怪。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則充滿了反社會主義的思想，隨時伺機作亂。所以說思想改造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徹底的，若不挖掘思想根

源，徹底改造，每逢遇到某種運動，或者某種機會，經不住考驗，搖擺不定。有的人在舊社會裏鬱鬱不得志，而在新社會盡管對他待遇優厚，由於野心趨使，也不會有所滿足，以怨報德的反動言行除說明愚蠢外，對社會主義之國本亦不能動搖於萬一也。

即以天津市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委聶國屏來說，自入社會以後，爲了職業問題，東奔西走，涉危冒險，始終未能如願以償；但自解放以後，雖是過去歷史複雜，而政府不究既往，仍以寬大爲懷，一再提携，從目前來說，對他政治待遇，職務的分配，不爲不厚，以他歷史來看，現在可說是飛黃騰達。他的愛人初文尙說過，“現在聶國屏是有生以來的黃金時代”，這確是肺腑話。但是由於他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作祟，對黨和政府不獨不爲報德感恩，反與人民爲敵，自是令人難以容忍。我以爲他是聰明反被聰明悞，實在爲他可惜而復可懼。

聶國屏身爲副主委，應該在愛國愛教上給教友樹立良好的榜樣，與教友齊一步伐，携起手來，往前邁進；照這樣去作是多末光榮的事，詎料他是背道而馳。過去天

主教會已被帝國主義利用爲侵略的工具，至今思之，猶覺痛心。我們看他公然離間教友與政府之間的感情，居心何在？是否要利用教友爲他政治資本呢？使我百索不得其解。要想把教友領到那裏去？每念及此，不勝浩嘆之至！

還有愛國會常委、“廣揚”編輯高慶琛，在鳴放的前後，曾經利用職權的便利，寫些含沙射影的文字，並把些毒草當作香花移植“廣揚”裏面等等情況，不爲一一贅叙。高慶琛在其他報紙散布謬論不談，僅就“廣揚”而論，“廣揚”它是宣傳愛國愛教唯一的喉舌，又是教友學習的導師，倘有一句之錯誤，其影響所及全國教區，這是多末重要！把這重大担子放在他的肩上，可以說倚重方殷，而他竟利用爲散布謬論的園地，若任其氾濫，影響之大，何堪設想。

因此，對於他們進行幫助教育，挖掘其資產階級之思想，擊潰其散布之謬言，實爲治病救人之當前要務。喚醒聶、高午夜自思，倘不翻然悔改，若仍是徘徊歧途，則將爲人民所唾棄，亦爲教友所不齒，尙望其共三思之。

不許高慶琛放火放毒！

田 靜

天津愛國會常務委員、本刊編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高慶琛，在歷史上罪惡多端，解放後被判徒刑，蒙政府寬大處理，未予立即執行，並給其生活出路和工作的機會，而他不但知恩不報，反而處心積慮地向黨和政府進攻，企圖推翻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妄圖資本主義死灰復燃。

在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以後，高慶琛認爲有機可乘，謀陰向黨進攻。當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以後，特別是黨提出整風時，高慶琛又與社會上其他右派分子伙通一氣，對於國內形勢作了估計，認爲毛主席的講話就是“中共要改革政治路線的先聲”；“中共要整風，說明黨的內部混亂，社會主義制度也有問題”。近而，備安

平發表“黨天下”謬論，葛佩琪聲言要“殺共產黨人”，其他右派分子高喊要共產黨“下台”、“下驕”時，高慶琛更是得意忘形，連寫文章，爲反黨分子撐腰、打氣，並串連新晚報編輯、右派分子史振華一齊向“天津日報”，向天津天主教愛國會進攻。史振華鼓勵高慶琛作反黨的“積極分子”，於是高慶琛一馬當先，盡施其反黨反社會主義之技倆，充分發揮了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利用“廣揚”半月刊編輯職權，在“廣揚”上大量散毒，由隱蔽到公開，由單幹到合謀，把“廣揚”用爲向黨進攻的工具。

心懷叵測，意在言外

人們不禁要問：“廣揚”1957年第一期刊載的“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祭獻”到底是什麼意思？在半年以前，這首怪“詩”出現時，無

人能解其意。像一個謎語，它的底只有葛審（高慶琛化名）自己才知道；然而，今天，這首“詩”的含意是昭然若揭了。它不是甚麼文學藝術作品，而是一顆向黨進攻的毒草。高慶琛這裏用了十分隱晦的詞句辱罵共產黨：“如果你僅在口頭上宣佈愛你看不見的我，但你却從來不關心千萬個我的肖像；反而不斷地從他們身上吸來鮮血獻給我，你想，我如何能悅納你的祭品，——上你的當？”

高慶琛如“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那樣，巧妙地將反黨的文字用藝術的形式偽裝了起來，更巧妙地將它塗上一層宗教的保護色，而實際上是意在言外，別有用心。高慶琛說：“聖經上的話，怎麼講怎麼有理，哪邊（革命與反革命）說哪邊都有理。”先不論這是對聖經的極大歪曲，就其手法來說，是與帝國主義者如出一轍的。

高慶琛又在“廣揚”本年第二期上化名陳與義，以“雜談‘利益’與‘感情’”為名，誣蔑了正義的反帝愛國運動，並惡毒地向愛國會進行了攻擊。在這篇文章裏，右派分子用盡了花言巧語，但都圍繞着一個中心：即否認愛國

會是教友的真正利益與感情的代表者。他以“我認為作為愛國運動的組織形式——天主教友愛國會，就應該成為教友的正當利益和感情的代表者”來否定愛國會過去所領導的反帝愛國的羣衆性的鬥爭是建立在教友羣衆正當利益與真實感情基礎之上的。一句話，他認為愛國會沒有代表了教友的利益和感情。這真是一個惡毒的蠅蟻。

右派分子高慶琛還沒有和社會上的某些右派分子打通一氣的時候，就這樣隱蔽地開始了鬼蜮活動。在此同時，高慶琛還寫了不少的“半月談”、雜文，字裏行間，毒氣沖天，現不一一列舉。

伺機而起，得意忘形

今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以後，各地還沒有傳達，高慶琛從北京聽來片言只語，加以歪曲，便在愛國會工作人員中廣為散佈，製造混亂。他說“毛主席說農業合作化搞錯了”，又說“主席也承認了錯誤”等等。另外，高慶琛迫不及待地找到“新晚報”右派分子史振華一起，估計了當前的政治形勢，他們認為“毛主席的講話，是中共改革

政治路線的先聲”，“如不改革，即將發生‘匈牙利事件’”。從此，高慶琛像把握住時機，不無所宗地公開向黨進攻了。

高慶琛一方面通過右派分子史振華的關係，往新晚報投送“是歡迎批評呢，還是負氣？”、“何必憤慨？”等向黨正面進攻的文章。另一方面，在“廣揚”半月刊上寫文章向全國教友進行煽動。

在本年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廣揚”的“半月談”中，高慶琛公開號召一切反黨分子參加他的戰團。他說即使是“帝國主義思想影響”也可以出來“泛濫”。他認為，如果不許可“帝國主義思想影響”出來“泛濫”的話，都是“唯恐天下大亂的看法，都不過是‘掩耳盜鈴’而已”。由此可以看出，高慶琛渴望天下大亂之心如火如荼。

在以上的文章裏，高慶琛更借反“教條主義”為名向黨進攻。他說所以有帝國主義思想影響，“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抱有這種思想的人本身認識不清，但另一方面也是與教條主義者的簡單粗暴，壓服禁止分不開的。”問題十分清楚，所謂“帝國主義思想影響”，顧名思意：從“帝國主義”而來的“影

響”，但高慶琛卻在這裏顛倒黑白，把莫須有的罪名，加諸於“教條主義者”的頭上，這不是別有用心又是甚麼呢？

高慶琛還進一步地替帝國主義、反革命分子辯解說：“過去有些並不見得是帝國主義思想影響的東西，也由於教條主義風氣的影響，被當作帝國主義思想看待了。”而且還挖盡心思地捏造了事實，他說：“例如有些人只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上對一些事物作了有保留的看法，也往往會被扣上‘這是帝國主義思想影響’的帽子而不敢堅持，從而對愛國運動甚至國家的宗教政策發生了懷疑，影響了愛國愛教的積極性的發揮。”這種捏造出來的事實，決不能取信於人。因為，很明顯，所謂“從宗教信仰角度對一些事物作了有保留的看法”，最大的問題也只不過是“世界觀”的問題而已，在這個問題上作不作“有保留的看法”，實質上是信教或不信教的分野。國家既規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允許用宗教的哲學觀點來解釋自然界的存在問題，誰曾經冠以“帝國主義思想影響”呢？在這個屬於原則性的問題上既然抱肯定態度，那麼在屬於一些

宗教性的細則問題的看法上，還有什麼非議呢？

高慶琛把教條主義描繪得比帝國主義還可怕，把帝國主義思想影響也歸罪於教條主義，其目的何在呢？高慶琛這樣咬文嚼字，無非是挑撥是非，故意地製造玄虛，從而為右派分子聳國屏的所謂帝國主義、反革命分子“不是從政治上反對共產黨，而是反對共產黨的唯物主義”的鬼話鼓吹罷了。但是，這個陰謀已瞞不過羣衆的眼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居心，終究大白於天下。

猖狂進攻，原形畢露

在今年五六月當中，是右派分子最猖獗的時候，高慶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氣焰，也隨着達到頂點。高慶琛知道共產黨與羣衆的血肉關係；社會主義建設這樣突飛猛進，也說明黨在領導這項工作中是得到成千上萬的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的支持的。右派分子要向黨進攻，當然先要從打倒左派下手，攻訐積極分子，在他整個的戰略佈署上是少不得的。

因此，在本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廣揚”上，高化名謝稚圃，以“春在微言”為題，向擁護

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開了火。他辱罵積極分子是“見油漆則渾身發癢，或吃牛奶遍體發紅”的“過敏症”者。積極分子不許他借整風機會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他說這是“步步設防，唯恐天下大亂”；積極分子對他諫言，他說是“滿臉‘原則性’，不苟言笑。對別人的看法一律一言以‘斃’之。”通篇文章，處處是咀咒，句句是謾罵，每一個字都是射向積極分子的毒彈。

高慶琛野心勃勃，四出煽風，到處搜羅有利於向黨進攻的言論，所以逢人便問：“你有什麼意見？”“不鳴放鳴放嗎？”他問愛國會的一個幹部說：“鬥爭文主教（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的事有人提出意見嗎？”繼而，高慶琛與“新晚報”右派分子史振華勾結一起，合謀向愛國會進攻，由史振華寫了一篇“向愛國會吹灑一些和風細雨”，對愛國運動大肆誣蔑，說愛國會“挖天主教的牆角”，挑撥教友與愛國會的關係，並把愛國會幾年來領導愛國運動工作的成績一概否定了。這篇文章交高慶琛在“廣揚”發表，但當時為領導察覺，未允發表。右派分子的進攻一計未

成，頗爲不滿，認爲這是“壓制民主”，不肯放棄他那失算的企圖，於是又竊用“廣揚”編輯部通聯組名義，向全國通訊員點火。本年6月1日，高向全國各地通訊員發出徵稿信，要求通訊員“盡量”搜集各方面對黨不滿的意見，“寫成專題”供給他，以作進攻的武器。另一方面，他計劃在“廣揚”上開闢所謂反對馬列主義的專欄；並想以“廣揚”名義召開座談會，他說：“讓大家鳴一鳴，出出氣”。更進一步想出：神父、主教當選政協委員的很多，於是到處搜集各地神父主教在政協會上的發言，如有對黨不滿的言論，一律拿來充斥他反動的資囊。“新晚報”右派分子史振華從“河北日報”上發現“趙振聲、范學淹在政協河北省一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摘要”內容有利於向黨進攻，於是把這篇東西供給了高慶琛。高同時又蒐羅了右派分子聶國屏在天津市委統戰部向黨進攻的發言和拚湊了天津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會宗教界傳達會時青年教友在會上提的一些意見，寫成“天津青年教友的‘爭鳴’”一起在“廣揚”第12期上發

表。

高慶琛並沒有參加那次傳達會，他捕風捉影地大肆撥弄是非，甚至其中出現了捏造事實的報導。那一則“北京氣象學院有這樣一個規定：非黨、團員不能畢業。教友米紀德在該院學習，因有宗教信仰不能畢業，終致退學”的情況，純系虛構，給黨和政府欲加之罪。事後，米紀德教友的父親米華峯先生數次到愛國會抗議，指出“廣揚”是捏造事實。米華峯先生說，米紀德在氣象學院學習得很好，他享受和教外同學一樣的待遇。由此看來，高慶琛向黨進攻是不擇手段的。

總之，半年多以來，“廣揚”在右派分子高慶琛的把持下，成爲向黨進攻的工具，離開了反帝愛國的根本立場，走上與此對立的道路。因此，不能不使人痛心疾首。我們愧對全國廣大讀者，我們決心拔去毒草，洗清“廣揚”被右派分子沾污之處。“廣揚”負有崇高的任務，不許右派分子高慶琛利用這塊園地放火放毒。我們繼續高高舉起反帝愛國愛教的旗幟，向社會主義邁進！

界 限 明 得 很

· 鄭 紀 中 ·

天主教內的右派分子聶國屏說：“……在解放初期的反帝鬥爭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明，傷害了很多虔誠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這些人到現在還背包袱，感不到新社會的溫暖。他們說：我們反對共產黨，不是從政治上，而是反對共產黨的唯物主義。但是都歸罪於政治上反動，和帝國主義有聯系，心中不舒服。”

話說得雖籠統，骨子裏却十分惡毒。首先，這是為帝國主義分子及其爪牙開脫了罪名，他們不過是“反對共產黨的唯物主義”；其次反帝鬥爭目標搞錯了，沒有打敵人而打了自己人，或者再說得明白些，就是沒有打擊帝國主義而打擊了信仰，所以傷害了虔誠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再次，反帝鬥爭“遺害”無窮，時至今日那些還帶有反動情緒的教徒，都是當初反帝鬥爭“得罪”了的。不過區區

百餘字，聶國屏把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偉大成績就給斷送了，這真是一筆最可恥的出賣。有些一直敵視反帝愛國運動的人，這次向聶國屏拍手喝采，想來不是偶然的。

津市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是在1951年開始的，事隔六、七年，聶國屏或許不致如此健忘，但我們却也無妨把初期的反帝鬥爭情況幫他回憶一下。

反帝反了甚麼人

反帝鬥爭不是愛國教友們故意製造出來的，乃是由於帝國主義分子以宗教為掩護猖狂地對中國進行侵略的必然反應。我們不去說那些罄竹難書的帝國主義傳教士的罪行，且說說帝國主義分子貴賓。文貴賓在八國聯軍蹂躪了我們的國土的第二年來到中國，數十年來積極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效力。他一貫仇視中國人民，他稱中國人是

“豬”，是“低等民族”，誣蔑中國人民“愚鈍昏聩”。他先是充當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日寇侵入以後，又投靠日本特務機關，最後，又偎依在美帝國主義的懷抱，數十年來，搞間諜活動，搞特務組織，散布帝國主義毒素，毒害中國人民，真是作惡多端。在解放後文貴賓更變本加厲，仇恨共產黨及新社會，竟命令我們說：“誰歡迎解放軍就是歡迎魔鬼，下地獄，”“不准看報紙，不准入華大、革大、南大，以上三個大學是魔鬼大學。”文貴賓還積極主使帝國主義分子卜相賢等進行間諜活動，協助帝國主義分子雷震遠組織特務組織“民衆建國協進會”和“公教青年報國團”，指使帝國主義分子柏恩組織反動組織“聖母軍”。文貴賓的這些活動是政治呢，還是宗教？廣大的愛國教友對這樣一個凶惡的帝國主義分子開展了鬥爭，究竟有甚麼界限不明呢！卜相賢、鮑翹華、房如晦等人爲美國諜報機關搞情報，這是神父們所應作應爲的嗎？“民衆建國協進會”“公教報國團”這些潛伏的美蔣特務組織，也能算公教團體嗎？政府把這些天主教的敗類羅之以

法，是否就是界限不明了呢？

界限明得很！對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及其爪牙進行鬥爭，恰如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活動一樣，政治界限都明得很！他們進行的不是宗教活動，他們玷污了聖教會。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正是爲了維護聖教會的純潔。正如聖經上說“把稗子拔出來，捆成捆留着燒，至於麥子都收集在倉房裏”，這界限不是明得很嗎！

“聖母軍”案翻不得

右派分子聶國屏會苦心地想爲“聖母軍”翻案，說它不是個反動組織。或許在這個問題上又界限不明了吧！“聖母軍”的罪惡活動對任何一個真正的教友都還是記憶猶新的事，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把他“忘”掉。

“聖母軍”哪裏像個公教組織呢？隱蔽的集會，嚴厲的“軍紀”；有暗號，有密語；收進來的是情報，放出去的是謠言。這與“恭敬聖母”相去多麼遠！“聖母軍”是國際性的反動法西斯秘密組織，它在天津是在解放前夕成立起來的，成立的目的就是爲了在天主教內建立一個反動的核心組織，用

來控制教友，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動。這個反動組織的骨幹分子，是些帝國主義忠實走狗、反動黨團分子、特務間諜、惡霸流氓……等等，是一夥背叛祖國的亡命徒。聖教的廣揚能靠了這些人嗎？政府明令取締了這個反動組織，無異是割去教會身上的一個毒瘤。“聖母軍”的罪證如山，對聖教會的禍害無窮，——這個案翻不得！我們看得清，這個反動黑幫沒有給天主教帶來絲毫好處。記得遠在政府尚未明令取締之前，“聖母軍”的反動活動就已經為很多愛國教友察覺，紛紛揭發和指責；有許多正直的教友，雖被反動分子多次拉攏亦不加入。當政府宣布取締時，真是人心稱快！此情景歷歷如在目前，這難道不是界限明得很，而是甚麼“傷了感情和自尊心”？

津市公安部門在1951年曾破獲了一個“聖母軍”的案子，有幾個“聖母軍”骨幹分子在帝國主義分子滿濟世指使下破壞愛國運動，他們寫了許多恐嚇信威脅愛國教友，還準備向愛國運動領導人投擲尖刀進行恐嚇，其中有一把尖刀便是準備投向聶國屏的。顯然，這是不能理解為反對唯物主義的，却只能“歸罪

於政治上反動，和帝國主義有聯系”，不這樣看便實在“心中不舒服”。

聶國屏的歷史上寫滿劣跡，解放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念舊惡，給以極高的地位和榮譽，但聶國屏却恩將仇報，蓄謀向黨進攻；反過來對會與他尖刀相見的“聖母軍”却“以德報怨”，妄想為其翻案。這豈不也是界限明得很嗎！

背的甚麼包袱

共產黨從來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這是真誠坦率的態度。我們信仰天主，我們反對馬列主義中的無神論的部分，我們也從不掩飾這一點，這也是真誠坦率的態度。黨並不反對我們信教，只是希望和我們“求同存異”，共同建設自己的國家；而我們也應該“求同存異”，我們所希冀的是黨和政府給予充分的信仰自由。我們彼此分歧的地方，從來都是真誠坦率的，誰也不對誰有所粉飾。如果有人認為只有共產黨必須放棄無神論或天主教徒背教以後，兩方面才能在政治上團結一致，顯然，這是極其荒謬而又不可能的事。我們都承認在信仰問題上有嚴重的分歧，這沒有什麼可怕，因為這是事實，正視這個分歧，更有

利於彼此尊重，也就是“存異”。

我們不接受唯物主義，這不能成爲反對共產黨的借口，因爲共產黨並不因爲她信奉唯物主義而對我們有任何迫害。右派分子聶國屏假借他人之口說，“我們反對共產黨，不是從政治上，而是反對共產黨的唯物主義。”爲甚麼把僅僅在信仰上的分歧硬說成“我們反對共產黨呢”？既然共產黨是一個政黨而不是另外一種宗教。我們在宗教上所信的所行的，我們神長每天所講的，以及一切經言要理，對於共產黨說來，都應當被看成反對唯物主義的。但黨和政府根據法律保護了這些，並沒有“都歸罪於政治上反動，和帝國主義有聯系”，如果聶國屏的這種說法能成立，天主教勢必寸步難行，而宗教政策却成了保護“政治上反動，和帝國主義有聯系”的政策，這豈不也是界限不明了嗎？

重要的問題不在這一面。必須指明：以反對唯物主義爲借口，骨子裏却是爲了達到反對共產黨的目的，這是歷來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幹得最熟練的一手。解放前夕，帝國主義分子及其爪牙不就是在宣傳共產黨因爲是主張唯物的，

專門封教堂、殺教徒，還繪聲繪影地宣傳過甚麼“教難”之類嗎？我們聽了曾戰戰兢兢，準備致命。解放以後，苦於沒有致命的機會，可算是“僥倖”活下來了。至於越活越有生氣。但這些年來，也還有些暗藏在教會裏的反動分子，還是不斷宣傳唯物主義的“恐怖”，它確實使許多教友的心情不能舒展。就是聶國屏所說的解放初期的反帝鬥爭的那個時候吧！教會裏到處流傳着帝國主義分子所散布的反動小冊子，如“恐怖的共產主義”、“天主教怎樣對付共產黨”、“學習參考”等等，其特點都是以反唯物主義爲名的。而今天，聶國屏又把這些調調重彈，却反過來扣上一個“政策界限不明”，這不是公然爲這些罪惡活動撐腰嗎？

我們確知有些善良的教友，對於政治問題和宗教問題往往糾纏不清，一聽說唯心唯物，心情突然就緊張，立刻感到有如大難臨頭，殊不知那些別有用心的分子，放的是反唯物主義的箭，射的是共產黨。我們和唯物主義政權已經相處了八、九年，並沒有什麼可怕，因爲這個政權確實地執行了保護宗教的政策。帝國主義分子及其爪牙，還

慣用宗教手段達到政治目的，如愛國運動初興起時，公開恐嚇愛國教友簽名就是“裂教”、就要“下地獄”，對於進步的神長教友，動輒以“摘神權”“除通功”相威脅，對於控訴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散布所謂甚麼“良心不平安”之類。這些都曾經使一些教友在思想上糾纏不清。我不知聶國屏所說的：“到現在還背包袱”的是否就是這些人。幾年來愛國會的工作有很大成績，其中包括幫助這樣一些教友放下包袱。這些教友，雖然一時在政治問題和宗教問題上糾纏不清，但是他們既看到祖國的可愛，又過着愉快的宗教生活，他們是感到新社會的溫暖的。

右派分子聶國屏所說的“感不到新社會的溫暖”的人，可能是另外一種人，他們甘心情願地背着包袱，甚至不敢打開這個包袱。他們是一向依附於帝國主義的，認賊作父，對帝國主義無限忠心，他們仇恨共產黨和新社會，仇恨愛國教友，他們的包袱中裝滿了陰謀鬼計，伺機便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愛國運動進攻。如果反帝鬥爭是傷了這些人的“感情和自尊心”，這豈不是好得很！何來的界限不明？

心中舒服得很

我們和右派分子聶國屏的感情不一樣，我們不是“心中不舒服”，而是“心中舒服得很”。

我們趕走了帝國主義分子，反掉了反革命，我們反帝鬥爭是正義的，界限明得很，天主教擺脫了這些敗類的控制，洗去污塵，現出純真，廣大教友的心中實在是舒服得很！

儘管我們不能接受唯物主義，我們却熱愛共產黨，熱愛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有無數的優秀教友同樣在黨的栽培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崗位上立了功，成爲模範、成爲先進生產者，黨和人民給予他們多大的信任和榮譽。這是愛國的表現，也是遵守天主誠命的表現。每當這種喜訊傳來的時候，就彷彿是一種幸福和光榮感拂過來，內心舒服得很！

宗教生活過得好，政府的宗教政策貫徹得日益深入，教會受到政府各方面無微不至的照顧，心中怎能不舒服得很！

愛國運動搞得好，愛國的旗幟更高高地舉起，全市教友團結一致，浩浩蕩蕩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向社會主義進軍，我們和全國人民

站在一條戰線上，我們不因為信仰宗教而有任何孤立的感覺，我們和六億人民共呼吸，心中怎能不舒服得很！

儘管政府在貫徹宗教政策上還有缺點，儘管愛國會的工作也還有缺欠的地方，當然也還有我們教

友在努力追求進步方面還有不夠的地方，但這些，都不能掩蓋我們的主要的心情：我們心中舒服得很！我們看到了勝利，看到了偉大的成績，這是主要方面。在這一點上，我們和右派分子的感情不一致，正也是界限明得很！

記右派分子高慶琛的嘴臉

·張奇·

昨天，

利用“廣揚”向黨進攻放冷箭；

今天，他表示：

“怨我業務能力低，政治見解淺”。

昨天，他還狂喊：

“社會主義制度處處有缺欠”；

“選舉制度不民主”

“監察制度太黑暗”；

今天，一再聲言：

我只不過是“字裏行間找內幕”，

請別誤會，“我的原意很簡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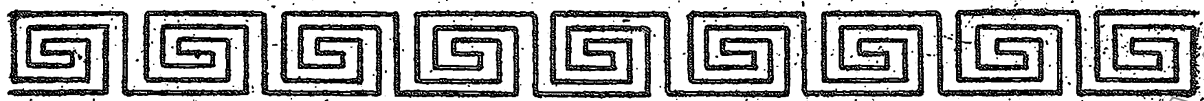
昨天，他稱贊：

備安平真“英雄”，“言人所不敢言”，

夜裏作夢和“英雄”會見，握手言歡。

今天，

一切皆成幻……過眼雲烟。



高慶琛的反動臉譜

· 隨 守 義 ·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高慶琛，出身於大地主家庭。解放後因有歷史罪惡，在上海被捕，被處徒刑二年緩刑。1951年來津，經我會吳克齋故主委介紹來會，在“廣揚”半月刊編輯部工作。1955年，當選我會常務委員。

由於高慶琛對黨、對社會主義懷有刻骨的階級仇恨，解放8年來，不僅沒有得到改造，更變本加厲，想盡一切辦法破壞社會主義事業和天主教教友的反帝愛國運動。尤其在中國共產黨號召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之際，高借着“鳴放”的機會，大肆進攻，四出煽風點火，散放毒素。下面打算把他的反動罪行約略地縷述一下，勾出他的反動臉譜。

借學習為名散布反動謬論

高慶琛一向以所謂高級知識分子自居，輕視勞動人民，不甘心工人階級的領導。在高慶琛初來愛國會工作時，愛國會的工作人員以滿腔熱情從事愛國運動之際，高慶琛竟利用大家的進步思想還不够鞏固的機會，在學習會上公開散佈“人活着為吃飯”的反動謬論，企圖渙散同志們的愛國意志，麻痺大家的政治警惕性，以開闢他反動言論的市場。

在學習會上他一貫故意裝痴，提怪問題，製造同志們的思想混亂，他說：“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還會有矛盾，那麼社會再向前發展是否又應當恢復私有制，重新出現階級呢？”又說：“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是對的，但是歌頌的太多，給捧假了。”又說：“為什麼歷次農民革命被迫壓者沒

上台，而壓迫者反而上了台呢？”凡此種種，說明其居心狠毒，企圖把大家引入迷途，存心污蔑革命。

在學習時事時他說：“斯大林要
不死，能揭露他的錯誤嗎？不能。那麼，匈牙利或其他東歐國家就許鬧更大的亂子，死了無辜也算對嗎？”他完全否定了帝國主義者，霍爾蒂分子，對匈牙利人民的進攻。他又說：“無產階級專政好，爲什麼還出現個人專斷呢？這是制度有問題。”在黨號召鳴放時，高慶琛發展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他在學習會上說：“馬列主義沒有結束真理，不能說以後不准越此範圍，誰是誰非只有通過鳴放才可以解決，否則就是教條主義。毒草也不一定是毒，很難說，毒草也不一定沒有好處。‘人民日報’對雷海宗的意見，（雷是南開大學的教授，右派分子，曾發表過‘馬克思、列寧主義停留在1895年’的謬論——作者。）結論下的太早。‘人民日報’是口頭上同意‘鳴放’，實際不同意。”又說：“教條主義者說蘇聯樣樣都好，不許說不好，結果出了匈牙利事件。”他的反蘇面孔有多麼露骨！他極端反對鳴放要有標準，他說：“既是鳴放就不應有原

則，什麼話都可以說。學習社論就是限制鳴放，因爲不學社論也要鳴放。”又說：“幫助黨整風就要和風細雨，而過去‘三五反’、‘思想改造’也都是內部矛盾，爲什麼要粗風暴雨，是否有欠公允？”由於他的鼓動，學習會上就有人說“三五反”、“肅反”都是“私設公堂”。高慶琛在學習會上公開散布的反動謬論真是罄竹難書。因爲他是政協宗教界學習委員會委員，又是學習組長，所以造成的壞影響很大，曾引起許多人的不滿，也迷惑過少數人。今天大家才徹底的認識了他的真面目。

一貫以流言蜚語製造混亂

高慶琛在平日的反動言論更是惡毒。他非常厭惡人們擁護黨、熱愛黨，有人給“廣揚”寫文章，文章中有“我們的黨”的字樣，他很氣憤地說：“你們的黨！什麼黨？黃牛黨！”他說：“匈牙利事件，蘇聯不能出兵，要出兵就是干涉匈牙利內政”“匈牙利人民喜歡什麼制度，這是匈牙利人民的自由，別人（指蘇聯）不能干涉。波蘭也是一樣”；更陰險的是說匈牙利事件的參與者“有50%是天主教教友”，陰

謀挑起教友同情匈牙利的叛徒，反對社會主義，包藏着“天主教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禍心。今年春天他因故去京，回來就散布說：“毛主席講話了，說農業合作化搞糟了，毛主席也認錯了，北京各大學罷課，有的地方罷工”，把局勢形容得很緊張。後領導上找他談話，指出這樣無根據的宣傳，影響不好。他不但接受批評，反而負氣質問同志們，並在學習會上大放不滿之辭，最後乃致於寫信向領導上抗議。

鳴放期間，高慶琛更是囂張，在會內會外宣傳，學社論再鳴放是“不放手”、“怕鳴放”、“別有用心”。他還散布支持社會上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許多反動言論。

勾結串連，煽風點火，

恨天下不亂

高慶琛與我會另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副主委聶國屏勾結在一起，一唱一合，向黨、向愛國運動放射了許多毒箭。高慶琛一向是聶的參謀和支持者，他們反動思想一致，羨慕美國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真是在反動的泥窪裏“相濡以沫”。聶國屏在天津市委統戰部發言以前，

兩個人就計議放毒；事後高慶琛在“廣揚”12期上轉載。聶國屏是民盟天津市委員，高在向黨進攻時還扮演了一齣“火綫入盟”的醜劇，由於反右派鬥爭開始了，沒有演出就被揭穿了。高慶琛與天津“新晚報”的編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史振華過從甚密，經常在一起密謀，對愛國運動，對政府的各項政策肆意歪曲、污蔑。高與史每日在一起借酒澆愁，酒後發洩不滿，傾訴“心腸”，用高慶琛自己的話說：“我們在一起，什麼反動話全說。”聶國屏，高慶琛，史振華，這三個右派分子結成一條反動鎖鏈，企圖阻止社會主義、阻止愛國運動勝利地向前發展。

高慶琛和社會上一切右派分子一樣，鳴放時期，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尋找各種機會煽風點火。他到處打聽神父、教友們有什麼意見，經常說“這個意見不過癮”“那個意見不尖銳”。一次他問我會一位同志：“某某為什麼不向愛國會提意見？”這位同志回答：“人家沒意見，”他很不耐煩地說：“這就是落後！”還有，他以邀稿為名，找了好幾位神父、教友，出題暗示，鼓動鳴放，以達到他向

黨進攻的目的，可惜神長、教友們沒有上他的圈套，因而高嘗嘆曰：

“你看鳴放了，神父們也不出來爭一爭，像避孕問題、有神無神問題等等，沒人寫！”

拉攏落後，打擊進步， 無所不用其極

右派分子真真不是“活着爲了吃飯”，而是爲了反動。高慶琛對愛國會的同志在內心深處都埋藏了明確的愛與憎，策略上是該拉的拉，該打的打，如他對潘雨田就極盡拉攏、利誘、威脅之能事，他對潘說：“你小子這點玩藝兒全在我手心裏了，幹記者的（指自己）還有好小子！”平日在潘鬧情緒或對領導不滿時，就拉他去喝酒，巧妙地使用了潘雨田作爲他的眼線。由於潘一向不求進步，所以幾年來就成了高慶琛向黨進攻的有力助手。高還對潘雨田說會裏的一切工作、會議全是“扯淡”，曾多次拖潘雨田消極怠工。高慶琛還拉攏潘雨田說：“我爲你說了許多好話，並爲你還挨了批評。”高把潘在生活上的缺點當作了控制他的資本，還惡意地叫他愈陷愈深。潘雨田便落在他的手心裏，忠實地爲其趨使。

高慶琛對進步分子和領導，可謂恨之入骨。他說進步“肉麻”，說擁護黨的人是“假積極”，“是一窩蜂”，背地裏辱罵領導是“山藥豆子”，“王八旦”；高慶琛幾年來無時無刻地不在打擊、破壞領導及進步分子的威信。高慶琛的企圖非常明顯，他想從愛國會內部作起，搞垮愛國運動，這次真像大白了。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高慶琛之所以如此的猖狂毒辣，不是偶然的。這是由於他是大官僚地主出身，根本仇視勞動人民坐天下；這是由於他長期受了帝國主義的培養，學就了一整套的資產階級活動手法；這是由於他對共產黨心懷仇恨，想從根本上推翻黨的領導；這是由於他從來就對自己過去的罪惡從未悔悟，從來未下決心改造自己；這是由於他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上去觀查國內、外局勢，從而作出完全錯誤的判斷；這是由於他不正視現實，利令智昏，想入非非，野心勃勃，蓄意造反。結論是：這一場孤注一擲的大賭博完全輸光了右派所有的資本。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現實是最無情的，高慶琛，如不猛醒，其結局將是不堪設想的。

右派分子聶國屏的面目醜惡

曹傳新

民盟天津市委委員、天津師範學院支部委員、右派分子聶國屏，在黨開始整風前後，利用各種機會發表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造謠誣蔑，煽風點火，積極向黨進攻。他誣蔑土改、三反、肅反等政治運動都是“搞錯了”；歪曲黨的宗教政策；誣蔑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宣揚美國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並且在學校裏利用民盟組織，煽動部分盟員制定了他們誣蔑為“黨風、團風、裙帶風”的黨團員名單，妄圖取消黨對學校的領導。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聶國屏沒有老老實實地交代自己的問題。

聶國屏爲什麼如此瘋狂地反對黨、仇視人民、誣蔑社會主義呢？這並不是偶然的，我們可以從他在解放前的醜惡的歷史裏找出一部分答案。

聶國屏的父親是冀東的大地主，後來投資於開灤煤礦和啓新洋灰公司，逐漸變成了買辦資產階級，

聶國屏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裏。

聶國屏受教育的過程是從西開天主教小學到基督教匯文中學、到美帝國主義辦的燕京大學，一直是在帝國主義辦的教會學校裏受奴化教育。聶國屏的家庭出身再加上他所受的教育的影响，他的頭腦中浸透了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1940年他離開大學以後不久，就幹上了投機倒把的勾當。

聶國屏在日偽佔領時期，經營過各種買賣。他和別人合營過“友星營造公司”；又在上海錦成錢莊入了股；和投機商人于啓運（解放後因販賣鴉片被捕）在馬場道開一個“啓運書店”，並和于啓運做山貨買賣；同時還在西開教堂前開過一個名叫“西漢商店”的委托商店。後來，爲了投機倒把方便，他乾脆搞起證券交易所（正茂證券行）來了。聶國屏投機倒把，當然也少不了與漢奸拉點關係，他請大漢奸徐良給寫牌匾，還和漢奸、偽唐

山市長于文成在一起鬼混過。

日寇投降初期，因為物價波動，聶國屏經營的投機商業倒閉了。這時，聶國屏竟又拉上一個漢奸關係，投到會在大城縣搞漢奸隊的杜福祥（解放後被鎮壓）的門下，搞起雜牌軍來了。杜福祥利用老西北軍的牌子，自稱第十一戰區第二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封聶國屏為中校秘書，和這光杆司令在一起，聶國屏作過等待蔣介石收編的“美夢”。正在這個當兒，聶國屏又認識了一個帶着巨額滙票的“接收大員”、高樹勳的機要秘書吳景略，來津為十一戰區籌備辦事處。聶國屏馬上又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這位“正牌”軍官的身上。聶國屏和他的伙伴們非常熱心地圍着吳景略轉悠，還親自參加了“接收”，正在好夢方酣的時候，高樹勳將軍起義了。

利欲熏心的聶國屏，又依靠天主教的關係，走上反共頭子于斌的門路。于斌因為掛着天主教中國首都主教的牌子，在梵蒂岡、西班牙、美國等地為蔣介石奔走，專門從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勾當。1946年，于斌從南京來天津，策動成立反動的“天主教文化協進會”，聶國屏積極參加了這

個工作。于斌指定國民黨特務劉迺仁負責組織理事會和監事會，劉迺仁在原聖功女中開了成立會，會上選舉劉迺仁為理事長，聶國屏也被選為理事。聶國屏在劉迺仁指下，積極為于斌奔走，“接收”了一所房子，由聶國屏負責修理布置，並在內成立了所謂“文化沙龍”的西餐部。此外還成立了“中庸中級晚校”、“歌唱班”等，發展了五六百會員，成為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進行反革命的策源地。

劉迺仁是反動分子，聶國屏和劉迺仁關係非常密切，他們在一起幹了一些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聶國屏自己是知道的很清楚的。

聶國屏的活動受到國民黨特務頭子邵華的賞識，邵華曾親到“天主教文化協進會”拜訪過聶國屏，並請聶到邵的家裏吃飯，親自動員聶國屏加入國民黨，聶國屏就在1946年底加入了國民黨。

不久，著名的國際間諜，綽號叫“二雷”的比國神甫雷震遠，在天津成立了反動組織“民衆建國協進會”，聶國屏亦被選為理事，這個組織在雷震遠領導下，有許多反動行為。

聶國屏仗着反共頭子于斌和反動分子劉迺仁的勢力，掌握“天主

教文化協進會”的組織，一條腿伸到益世報作了協理，一條腿伸到津沽大學作了講師，一下子變為身兼數職的要人了。

就這樣，頂着天主教各種反動組織的“理事”、大學講師、益世報協理頭銜的聶國屏，在解放前，一時名噪津門。

全國解放以後，聶國屏走的路子——漢奸——國民黨特務——美帝國主義間諜的路子斷絕了。聶國屏的名、利、享受的幻夢，如同肥皂泡一樣幻滅了。

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中，廣大的天主教徒對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展開了劇烈的鬥爭，聶國屏在這個浪潮中也參加了一些反帝愛國活動，黨和人民對他寬大為懷不念舊惡，選他當天津市人民代表安排他擔任高等學校的總務長，給了他極大的信任和照顧。

可是，渾身骯髒的聶國屏，怎樣對待黨和人民對他的信任呢？在整風開始時，他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得意忘形，反動面目完全暴露出來。我們舉幾個例子看一看：聶國屏首先反對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他在5月26日市委統戰部的座談會上說：“現在學校人很

多，突出的單有一套政治管理人員，既不參加教學，也不參加行政工作，是不是有必要如此之多，大家認為他們是‘象牙之塔裏的人’，在感情上對他們不舒服”。聶國屏不但在座談會上說了，而且也同他的嘍囉這樣做了，他們貼了許多造謠攻擊黨的大字報，誣蔑黨員幹部是監督他的人，要撤換他們。聶國屏為什麼反對政治工作人員呢？為什麼怕黨監督呢？為什麼在感情上對他們不舒服呢？明眼人一看就會明白，用不着加以解釋的。

聶國屏拚命地誣蔑肅反運動，公開替反革命分子叫喊。誣蔑肅反是“往往以打擊領導、打擊黨團員、侮辱領袖的罪名，判處徒刑”，是“侵犯人權”，他竟主張“把舊案徹底清理一番”。作為人民代表的聶國屏，在視察工作回來後，竟公開叫囂：“過去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今年都應該宣判無罪了。”

聶國屏還故意歪曲黨的宗教政策，挑撥天主教徒與人民政府之間的關係。過去天主教為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利用，對中國人民犯下了許多令人髮指的罪惡是人所共知的；解放後，人民政府一方面堅決打擊

（下轉第41頁）

用事實駁斥右派分子的謊言

——天津市立中心婦產科醫院訪問記

• 本刊記者 •

今年5月26日，“天津日報”發表了右派分子聶國屏在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發言中說：“有的單位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總認為他們歷史上有問題。因而使他們很苦悶。譬如，婦產科醫院有很多修女作護理工作，她們的工作雖然作得不錯，但是得不到信任。”

基於此，記者懷着渴望瞭解真實情況的心情走訪了聶國屏所提到的醫院——天津市立中心婦產科醫院，訪問了該院李希明副院長和在該院工作的楊樂斌、侯振元、湯國蘭(女)教友及仁愛會修女劉志遠。從記者親身了解到的情況上看來，與聶國屏所說的完全不符，充分證明聶國屏的發言是沒有根據的，是徹頭徹尾的捏造。其用心何在？請公正的人們去判斷吧！

關於一些基本情況

天津市立中心婦產科醫院的

前身，是“天津法國慈善醫院”(Hôpital général de la France de Tientsin)，後經政府征用，改為抗美援朝第三醫院，52年結束，次年改為天津市立中心婦產科醫院。

目前，在該院工作的教徒計修女19人，教友46人，基督徒20人；有宗教信仰的人佔全體職工總數的四分之一。因此，院方行政領導及黨、團工作中，除安排一般的工作以外，更由於有宗教信仰的職工人數比例很大，所以非常注意貫徹並執行黨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堅持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李希明副院長對記者說，在教徒和非教徒中貫徹宗教政策，領導上是有決心的，從我個人的思想上是十分重視的。因此，該院每年都要在羣衆中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從未間斷過。同時，醫院的黨和團的組織，特別重視宗教政策貫

徹的情況。特別在去年(1956)年，院方請了天津市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的負責同志親臨醫院，向全院職工作了有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講話，院方佈置了全院的討論，並把個別工作作得不够的地方作了檢查，那次學習進行了兩個月之久。

對教徒與非教徒一視同仁

不論是教徒與非教徒，院方一視同仁，都視為國家幹部，對於大家一樣重視、培養，幫助他們在政治上和技術上提高。侯振元教友沒有技術，後被送往進修班學習放射學，現在對於X光機從使用到檢修，掌握了一整套的技術。目前侯振元教友是該院放射學科的負責人，參加院務會議。劉潔真修女，楊樂臧教友都是助理員，現準備經過考試提升他們為護士。李志雲修女原是一位普通的護士，已經被提升為護士長。

在1956年天津市護士工作者會議上，楊樂臧教友被評為天津市優秀工作者，得到50元的獎勵金；張志清修女獲二等獎，得獎金30元，其次如楊妍琪(保守)、蘇國祥(修女)及宋景成、鄭德勝、劉清蓮教友等在1956年被評為該院優秀工作

者，很多人受到大會的表揚。

對修女的特別照顧

參加中心婦產科醫院工作的修女，得到了院方特別的關懷和照顧。她們雖然如同一般的國家幹部一樣工作，但是却得到很多特殊的照顧，她們的習俗也都受到了尊重。1956年，中央指示全國各醫院大力貫徹推行“消毒隔離”工作，婦產科醫院在推行這個工作時，在一般的工作人員中是順利進行的，但是碰到修女的問題就煞費了腦筋。修女在工作時，全都穿着會衣，戴着大葉帽子，當然不符消毒隔離的精神。李希明副院長曾與修女多次商談，希望她們在工作時換工作服，戴工作帽，但是她們仍然堅持她們的裝束。協商的結果，還是照顧她們的習慣，只請她們勤換換會衣和白帽子而已。

在工作中，為照顧修女，根據他們的意見，在房屋條件困難的情況下，給他們專用的廁所，還給他們自己專用的更衣室。每逢大占禮，也是通權達變，給他們倒班，使她們如意地過宗教生活。此外，修女每年要舉行避靜，院方均給她們以便利。今年避靜時，領導上

給她們一個星期的工夫作避靜。在工作時間以外，修女們的活動是不受任何干涉的。

在醫院感到房屋最緊張的時候，仁愛會修女院向醫院方面要一間臨街的屋子作傳達室，爲了照顧修女的請求，搞好團結，醫院勉爲其難地把技工室騰出來讓給她們，而在牆角下搭棚解決技工室的問題。至於修女院用的暖氣、水電等等現時都由醫院方面照顧。醫院的工會辦的一些福利事項，如買奶粉、蛋品、肥皂等等，無不儘量優待在醫院中工作的修女，甚至也照顧修女院。

有一位修女，從幾年以前就請病假，不上班，用貴重藥品，每禮拜找院長簽一次藥方，一次就得十幾元錢，幾年來如一日，醫院從沒說過什麼。

目前醫院感到鏈霉素藥品緊張，每月才200支，本不敷應用，但修女院方面需要，請求院方照顧，院方仍然特別照顧了她們。

在去年肅反時，有一位修女（劉國華）曾與日特高鐵侯和敵僞唐山市長徐樹強漢奸有過往來關係，應在運動中作交待。但是院長怕因審查歷史和反動社會關係，而誤觸

其宗教感情，便決定叫她在“特別小組”（由教友組成的）會上交待。羣衆爲此還很不滿意，給院長提了很多意見，院長很耐心地給大家作了解釋。由此可見，對於修女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

記者當面問劉志遠修女聽沒有聽到其他修女談過在醫院有誰受歧視，不被重視？劉志遠修女連連搖頭，表示連聽也沒聽說過。

侯振元教友氣憤地說：我現在是科室負責人，任何一次院務會議我都參加，從沒聽說對有宗教信仰的人另眼看待。更沒有“不信任”。聶國屏的發言毫無根據，應該把他叫來，在我們醫院裏體驗一年半載的再說話。

楊樂斌教友含淚訴說了過去帝國主義把持醫院的黑暗景況，並用大量事實駁斥了聶國屏的謬論。他說：“劉國華修女就要到手術室去工作；李志雲修女當了護士長；李佃慧修女管藥房，毒藥、麻醉藥由她一手經營，這難道是不信任？”楊樂斌教友說：“過去杜森（原來醫院院長，法帝國主義分子）大姑奶奶就公開地罵王桂蘭姑奶奶是‘豬’，自從李副院長來了以後，再也沒有人罵修女了！說到受歧視，不信任，

從前和現在怎麼能比呢！”

湯國蘭教友也非常憤慨，並指責了聶國屏是有意地造謠中傷，挑撥離間。她用自身的經歷，證明了在這個醫院工作是得到充分信任的。他們都在愉快地為廣大勞動人民的健康和社會主義事業獻身。

限於時間的關係，記者沒來得及遍訪中心婦產科醫院的教友，但

從部分教友的憤怒情況看來，從這些片斷地情況看來，聶國屏的確在造謠誹謗，旨在從宗教感情上煽動教友與黨結仇，但這種惡毒的用心是難以得逞的。事實勝於雄辯，我們要質問聶國屏：你向黨進攻的謊言根據何在？你無中生有，捏造事實的企圖又何在？

我親眼見到的事實

張鼎鈞

在政府的幫助下，天津若瑟會及仁愛會的修女們成立了若瑟縫紉合作生產組，光是資金方面，政府就撥給了一千多元，另外還購置及調撥來縫紉機11台。在人力方面由天主教愛國會調去兩位幹部在業務上協助和在技術上指導修女生產。服裝鞋帽供銷部一位負責業務的張毓湘同志就曾經對修女說過：“你們好好搞吧，沒問題，保證滿足你們的要求，我們在開會的時候，上級就指示我們對你們社要特別照

顧”。還有年老多病不能工作的修女，政府每人每月撥給15元補助費。有一位在中心婦產科醫院作縫紉工作的仁愛會劉淑慧修女，因年老行走不便，醫院特別照顧她，把縫紉機放到修會，讓她坐在家裏為醫院工作。這是修女得不到信任和照顧嗎？鐵的事實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右派分子聶國屏的說法是存心誣蔑，是別有用心的。

春在鬼魅現 言微毒害深

——斥高慶琛：“春在微言”

• 何家修 •

“題解”

右派分子高慶琛(化名謝稚繩)在“廣揚”本年第11期上發表一篇題為“春在微言”的短文。文章不過千把字，但字裏行間，真是滲透了對積極分子的仇恨。右派分子高慶琛由於反黨反社會主義，自然也就仇恨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所以高慶琛常說：看別人進步“肉麻”，歷次政治運動人們簡直是“一窩蜂”。尙不僅此，高慶琛甚至辱罵、毆打過積極分子，可見積仇之深。原因何在？只不過是因爲積極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骨幹力量，是人民中的優秀分子，所以也就成爲反動派的眼中釘。右派要復辟，則必先從打倒左派下手。高慶琛在向黨進攻時，放出的“春在微言”這一束毒箭，就是射向積極分子的。“在此春風化雨之中”，高慶琛乘機大放厥詞，

誠乃春常在而鬼魅現，言似微而毒害深。吾亦“心有所感而發乎聲”，故濡筆斥之。是爲解。

“過敏”

政治警惕性是積極分子的可貴品質。警惕什麼？曰：破壞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右派分子高慶琛不喜歡，便誣之爲“神經過敏”。高慶琛在煽風點火之際，到處強調“鳴放不應有原則”，揚言“懷疑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可以的”。積極分子對此有異議，高慶琛便懷恨在心，報以毒箭。他說：“思想解放，固然不錯；但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如在‘鳴’或‘放’之中有了不合於這樣標準的東西出現應該怎末辦？於是，步步設防，不敢放手，惟恐天下大亂。”在“鳴”或“放”中強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叫“設防”，就叫“不敢放

手”，可見我們與右派分子沒有共同語言。

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時，希望的是所向無敵，不許設防，力求放手。他指責積極分子是“惟恐天下大亂”，相對的自然就是右派分子“惟恐天下不亂”，這裏實在包藏着一顆禍心。尤有甚者，高慶琛把這種對社會主義敵人的警惕性與個別教友對政府宗教政策尚存懷疑心理等量齊觀，同稱其為“神經過敏”，蓋有故意混淆是非並兼而煽風點火之惡謀也。

“混淆”

誣衊積極分子把內部矛盾作為敵我矛盾，把教義教規問題作為政治問題看待：這是高慶琛射向積極分子的第二只毒箭。高慶琛舉例說：“按天主教教義，教友不得離婚，然而有人說了：‘不許離婚即是破壞婚姻法！’好大的罪名！如何承擔得起？於是只好睜一眼閉一眼了事。按天主教教義，教友在人前表示不信天主即是背教。有人稍示異議，即被目為：‘打擊進步’。於是乎，只好撒手不管了。”首先，高慶琛在這裏捏造情節，故意聳人聽聞，目的無他，就是為積

極分子扣上個破壞天主教的罪名。其次，退一步說，姑認為有高慶琛所列舉的這類事情，又怎麼變成了敵我矛盾呢！豈不有些“欲加之罪”嗎？但我們確知教會裏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其使用之慣技之一是借教義教規問題來威脅、打擊進步教友，試問這屬於何種矛盾？右派分子高慶琛為何視而不見？我看，高慶琛在這裏才是故意混淆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明眼人一望即知，不必多說”。

“胸襟”

右派分子高慶琛挖苦積極分子胸襟狹小，並且說：“胸襟與修養成正比”，可謂極盡刻薄之能事。他辱罵積極分子說：“每見有些自封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同志們，滿臉‘原則性’，不苟言笑，對別人的看法一律‘一言以‘斃’之’。即使在最謙遜的時候，也不過說一句‘等你再學習學習就明白了’之類的話，彷彿真理永遠在他那裏似的”。這一段話，字字是血口噴人，却只有最後“彷彿真理永遠在他那裏似的”半句話不幸而言中。在右派分子筆下，積極分子竟被形容得面目如此可憎。但字縫裏也吐

露了一點真情，就是：右派分子既怕“原則性”，又怕“斃”之，這豈不是在招供嗎？

“據說胸襟與修養成正比”，對積極分子如此“謙遜”的右派分子高慶琛，不知其胸襟如何？

“影 響”

當右派分子高慶琛蓄謀向黨進攻時，積極分子還天真地勸告他要“注意一些政治影響”，現在看來積極分子居心過於善良了。就這樣還觸怒了右派分子，再狠狠地射箭一只。右派分子腦子裏的反動思想在發漲，不說不行，所以勸也無效；而且，其目的正是要造成影響，何來的注意影響。高慶琛說：“因此，想說話的人先要在自己心裏盤算一下，這話說出來影響如

何。是今天說呢，還是明天說呢？是對張三說呢，還是對李四說呢？是照直說呢，還是拐灣說呢？是口頭說呢，還是書面說呢？是……結果，不如乾脆不說，明哲保身，何樂不為？於是鴉雀無聲，天下太平，‘影響論’者躊躇滿志矣！”高慶琛迫不急待地要向黨進攻，有人勸他考慮影響，這豈不傷害了他的“積極性”了嗎？右派分子高慶琛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向黨進攻，他不但天天說，到處說，照直說，口頭說，而且還拐灣的、書面的寫了這篇“春在微言”，亦可謂“躊躇滿志矣”。只可惜玩火焚身，自食其果，真是悔不該當初聽不進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這一邊，豈不可悲也夫！

（上接第34頁）

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活動，另一方面也堅決保護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這也是人所共知的。身為天主教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聶國屏對這些事實應該知道得更清楚，可是他卻別用有心地顛倒黑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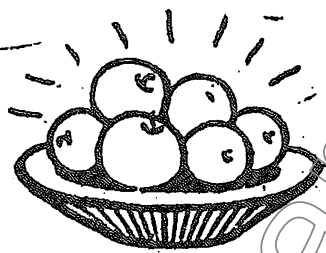
聶國屏的反動言行是罄竹難書的。聶國屏以仇報恩，辜負了黨和

人民對他的信任。可是他至今還躲躲閃閃，不老實交代問題。人民有權利要求聶國屏徹底交代問題，向人民繳械投降。我們警告聶國屏：只有徹底交代才是唯一出路，如果頑抗到底，那就是自絕於人民。

（原載：1957年7月24日

“天津日報”）

金蘋果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箴言：XXV. 11。

如此“禮貌”

·高乾·

右派分子高慶琛，逢人假惺惺，鞠躬點頭，“您好您好”，看來是一幅“謙遜”的面孔。其實向你微笑時，已經在內心深處記上你一筆帳，單等時機一到，就射一冷箭，對你大肆攻擊，甚至推到萬劫不復的深淵裏。

高慶琛曾說過：“我對別人的謙遜，不過是禮貌上的問題罷了。”好一個“禮貌”上的問題，說穿了乃是“笑裏藏刀”也。

瞞不過羣衆的眼睛

·羅大震·

有一種戰術，叫“麻雀”游擊戰，其戰略為：忽而聚忽而散，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爭取主動，以操勝券。

右派分子高慶琛在第一次交待問題時，全部罪行僅13條，與會者一致認為不老實。第二次作補充交待時，只不過是作了第一次交待的

復誦，與會者認為更不老實。高慶琛終於察覺出：此關難過。於是第三次交待時，洋洋萬言，交待了105條罪行。

從數字上看，“105”比“13”大8倍多，看來是“進步”多了！

不！這不是數學問題。這是一套作戰計劃，用的是化整為零的手段，交的是整舊如新的貨色。雖然“如新”，但畢竟還是“整舊”，因此仍沒有瞞過羣衆的眼睛。

名不虛傳

·苗實·

右派分子之所以為右派分子，並不需要什麼出人頭地的本領。取得“右派分子”的稱號，只需要有一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心，並為這顆心所趨使，足矣！

正直的人說，社會主義制度是無比優越的，共產黨是大公無私的、英明的，等等。而右派分子從生理上，從每一細胞裏厭惡人們這種公正的判斷。他們說“社會主義

有問題”，共產黨是“黃牛黨”。可巧，全國六億人民，偏有些不“識相”，成天口誦心唯地贊揚社會主義，歌頌共產黨，並深感作為今天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的光榮。而右派分子呢？說了：“牙搯”，又說了：“一窩蜂”！

嗚呼！右派分子果然名不虛傳，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原他來們是“獨具隻眼”！

想入非非

·左仁·

祖國的生機像春夏之交的花草一樣欣欣向榮，共產黨像太陽一樣地照耀着這塊蘊藏着無限寶藏的土地，全國六億人民愛護生養自己的土地，也愛護引人開發這塊土地的嚮導——共產黨。沒有祖國，便沒了培養生命的園圃，沒有黨，人們將茫然無所循，復歸舊轍，重蹈水深火熱。凡是社會主義的人，那怕三尺頑童，也懂得這平凡的道理。

而右派分子諸先生，却想入非非：抓住黨整風的機會大肆進攻，叛逆祖國人民，還無恥地狂叫：在歷次運動當中都有積極分子，而輪到向黨進攻的時候“沒有積極分子了”！請看，積極分子與右派分子

之為根本不同的兩種分子，一望即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只有待少數的右派分子去發揮；積極分子“自愧弗如”了。

“不過癮”

·四維·

癮者癖也。人皆有癖，每見有人苦於不能滿足其所好，則謂之“不過癮”。

右派分子也有癖，其癖曰反共反人民，曰陰謀策劃復辟資本主義，曰甘心充當帝國主義爪牙。總之，人之所好者，右派惡之，人之所惡者，右派好之。可算是一種怪癖。

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提了和風細雨的批評，大概不合右派分子高慶琛的口味，一再感到失望，逢人便說“不過癮”，“怎麼沒有人出來為文貴賓鳴放呢？不過癮！”

“怎麼教會沒有人出來為私有制鳴放呢？不過癮！”

由此可見，高慶琛之“癮”在於把共產黨推翻，把社會主義取消，非如此是“不過癮”的。只可惜，此癖“好景不常”，還是從根本上戒除了吧！

廣揚把我們引向什麼方向？

讀者來信



廣揚編輯部：

我們是貴刊的

讀者。我們一向熱愛自己的刊物——“廣揚”。自從“廣揚”創刊到現在大概是六年的時間了。在這不算短時間裏，“廣揚”配合我們的反帝愛國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全國愛國神長和教友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但在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及毛主席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來，“廣揚”連續的登載了一些不利於全國人民的團結特別是教友與政府之間的團結及一些譏諷、謾罵性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把天津右派分子聶國屏所發表的挑撥性的謬論，當鮮花似的刊出，並加了編者按語，形成給聶國屏撐腰打氣。又如：本年第10期“半月談”談到“有些人只從宗教信仰的角度對一些事物作了有保留的看法，也往往會被扣上這是‘帝國主義思想影響’的帽子而不敢堅持，從而對愛國運動甚至國家的宗教政策發生了懷疑……。”我

們不知道編輯部所指的是那些人？

今天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是允許有不同信仰和宇宙觀存在的，因而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就會有些不同，但是我們是能達到求同存異，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至於“不敢堅持”，那麼堅持的是什麼呢？這是可疑之處。我們認為編輯部這樣的說法只有不利於愛國運動的開展和破壞了政府的宗教政策的貫徹。第11期“半月談”談到“……遂使有些神長教友還不能盡量發抒自己的意見與看法，顧慮重重，因而影響了愛國愛教事業更進一步的開展。”這又是一種不現實的說法。因為由中央到各地都有我們的神長和教友參加國家權力機關和協商組織，是有充分的機會去表達我們的意見和看法的。這次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就更說明了問題。“顧慮重重”從何說起呢？與此同期登載的“春在微言”，由始至終除了是譏諷、煽動以外還有什麼呢？尤其使人不能忽視的就是12期以“迎接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誕生”的姿態出現，內容除了轉載了以上提到的聶國屏的謬論外，

特別是“天津青年教友的‘爭鳴’”一文，內容充滿了對現狀的不滿情緒，雖有些具體人具體事，我們認為有些問題編輯部還有必要重新證實和加以澄清。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不要把極個別事例當成是普遍的加以渲染。總之，這篇文章只能增加教友與非教友之間的隔閡。

“廣揚”編輯部應對讀者負責，應當向廣大的愛國的神長教友貫輸愛國愛教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

思想，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大變動時期，編輯部就應該引導讀者向正確的方向前進。而使人痛心的是，編輯部不但沒有這樣作，相反的還在借“鳴放”之機，進行煽風點火，用意何在？爲了維護“廣揚”的聲譽，作爲一羣讀者和教友的我們，向編輯部提出質問：要把“廣揚”轉到什麼路綫上去？把我們引向什麼方向？

天津市天主教房產聯合經營處全體教友 8月27日

聶國屏高慶琛在做什麼？

編輯同志：

我從“天津日報”的揭發材料中看到，天主教愛國會的副主任委員聶國屏和“廣揚”半月刊編輯高慶琛兩個人，犯下了嚴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聶國屏是愛國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我對他素來很尊敬、欽佩，但不知他是別有用心，以兩面派手法來騙取信任的。在這次大“鳴”大“放”當中，把他的真正的面目暴露出來了。我親耳聽到他說過：“聖母軍”不見得反動，是政

府搞錯了。

關於“聖母軍”反動不反動一點，是有人證物證的，不容抵賴。1951年天津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時，舉辦了“聖母軍”罪證展覽會，鐵證如山，其中還有滿濟世暗殺愛國運動領導人的三把鋼刀。這三把鋼刀中有暗殺聶國屏的一把。現在聶國屏還要爲“聖母軍”申冤報仇，硬着嘴皮說：政府政策界限不明，傷害了虔誠教友的感情和自尊心。這給教友和教會以多大的侮辱！

“廣揚”編輯、右派分子高慶琛，原來在歷史上有罪惡，被判過

徒刑，今不知悔改，繼續作惡，良心何在？他不惜利用純潔的“廣場”作為向黨進攻的工具，上對不起天主，下對不起教會和廣大教友。

必須正告右派分子聶國屏、高慶琛：必須老實交待，低頭認罪，不然是自絕於人民。

陳祖述 8月29日

決不許為“聖母軍”翻案

編輯同志：

聽到右派分子聶國屏說“‘聖母軍’反動不反動還成問題”的話以後，我實在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聖母軍”把我們純潔的教會給玷污了；“聖母軍”拖着我們善良的教友去反對政府，破壞愛國運動，做帝國主義分子的忠實走狗，喪失了民族自尊心。“聖母軍”的罪惡昭彰，充斥耳目，而聶國屏却說“‘聖母軍’反動不反動還成問題”，真是自欺欺人。

以我來說吧！我過去是反動組織“聖母軍”的成員之一，那時在帝國主義分子鄭化民的指使下，把原聖功女中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的名單抄給了帝國主義分子。鄭化民拿着那批黨團員的黑名單跟我說：“這是寶貝，等國民黨回來的時候跟這些傢伙們算賬！”請問右派分子聶國屏：“聖母軍”反動不反

動？假如“聖母軍”還有一絲宗教氣味的話，能搞這個名堂？抄黨團員黑名單跟念經恭敬聖母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在50年時，帝國主義分子指使“聖母軍”分子破壞參軍參幹，並說參軍參幹是為“魔鬼”服務。此外，記憶猶新的是：帝國主義分子卜相賢指示“聖母軍”分子把天津棉紡四廠的藍圖弄來；帝國主義分子滿濟世飲血結盟，投恐嚇信，組織“聖母軍”分子進行暗殺愛國運動領導人活動，等等。哪一點不說明“聖母軍”的反動本質？然而野心的右派分子聶國屏却要為“聖母軍”翻案，使帝國主義的陰魂復活，再來奴役我們。我身受過“聖母軍”之害，我決不能允許右派分子聶國屏使“聖母軍”死灰復燃，廣大的愛國教友也決不允許這樣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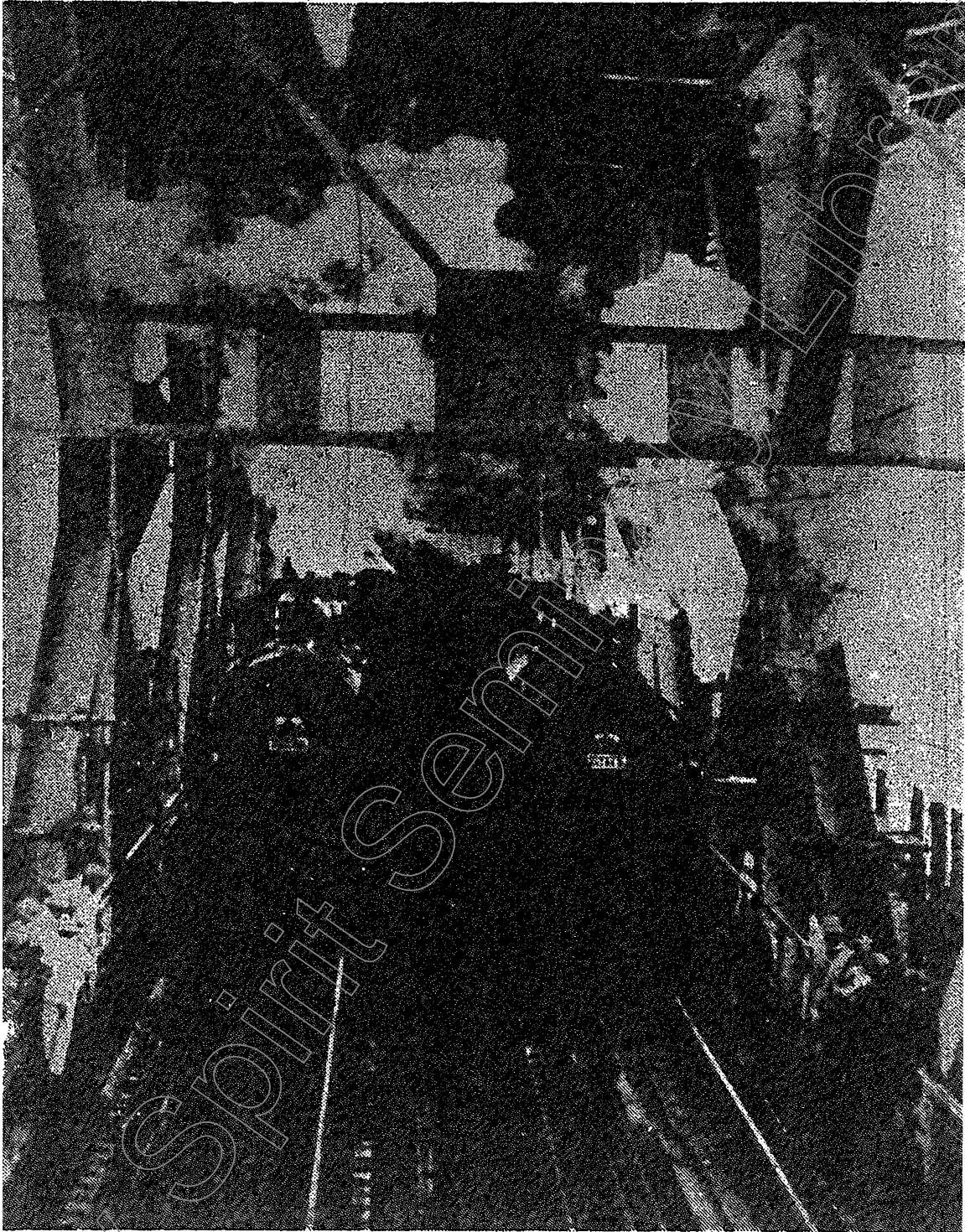
李學溫 9月1日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程	伯	多	祿	(6 8 歲,	山西潞安人)
靳	瑪	利	亞	(5 7 歲,	山西潞安人)
蘇	保	祿	肋	(5 3 歲,	天 津 人)
張	安	德	瑟	(7 5 歲,	湖南沅陵人)
陳	若	瑟	亞	(8 9 歲,	江蘇揚州人)
張	若	亞	納	(5 7 歲,	天 津 人)
王	瑪	利	納	(7 1 歲,	天 津 人)
張	保	納	利	(3 4 歲,	甘肅甘谷人)
盧	雅	納	望	(8 3 歲,	甘肅甘谷人)
王	瑪	利	撒	(5 7 歲,	甘肅甘谷人)
漆	若	望	達	(8 2 歲,	甘肅甘谷人)
周	德	肋	祿	(4 2 歲,	甘肅武山人)
陳	雅	加	達	(6 7 歲,	甘肅武山人)
陳	伯	多	祿	(3 4 歲,	甘肅徽縣人)
傅	若	望	望	(6 4 歲,	河北靜海人)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長江大橋的科學鑒定工作於9月3日正式開始。全部鑒定工作預計需要一周時間。這是列載重列車，各由兩輛機車牽引，併排上大橋，檢查鋼梁應力。

新華社記者李九齡攝（傳真照片）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